

# 蘇俄的反宗教鬥爭

·上·

李界平

## 壹 共產蘇俄之宗教層面概觀

在革命初期，布爾雪維克尙能限制他們的鬥爭止於反宗教宣傳，及後一旦掌握政權，即對所有宗教的教義及權力發動無限制的鬥爭。列寧甚且公開發出了對宗教的挑戰，說「馬克斯主義是唯物主義，對宗教是毫不仁慈的」。但迄於今日，列寧領導締造的政權正準備在今年十一月七日慶祝建國五十周年的時候，宗教仍然對共產主義構成一種主要的意理、思想上的衝擊浪潮，仍然是在共產教條治下蘇俄「人民的雅片」，整個共產組織也一直堅持，認為在宗教仍發生敵對影響之時，實無法組成一個嚴格管制的社會。再從另一角度以觀，經過長達半世紀有系統的迫害，無數俄人却仍堅持他們的宗教信念，宗教亦繼續為蘇俄社會及人民生活中強有力的影響力量。目前，僅就有限資料顯示，蘇俄至少有數十個不同的教派（註一），五千萬以上積極的宗教信徒（註二），加上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其中包括大量共產黨低層機構工作人員，祕密奉行宗教習慣與傳統（註三）。一部蘇俄的反宗教作品中會有這樣的表白，作者藉書中一個共產黨女教師告訴一位牧師說：「只要你活着，就够我們受的了」（註四）。這正說明了問題核心之所在——僅祇是宗教的「存在」這一單純的事象，即足為蘇俄共產黨權莫大的諷刺和至深的憂懼（註五）。

一如俄共對宗教的詆蔑，毛匪澤東亦貶責宗教為「阻礙國家進步、腐化人民的毒藥」（註六），細思毛匪此語，實不難體會共產主義之根本難以容忍宗教在一般人民心理上、思想上和精神上所存在之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影響。緬甸前總理宇努（U Nu）說得好：對於共產黨徒而言，「馬克斯主義便是唯一的信仰，唯一的經典，唯一的宗教。想成為馬克斯的信徒或共產黨徒，便必須在馬克斯主義與宗教之間作捨此就彼或捨彼就此的抉擇，絕不可能兩者兼得」（註七），此語實道破一切共產主義者之「宗教觀」，說明了宗

教在蘇俄可能的處境。

不僅以共產黨為限，任何極權獨裁者都宛如宗教教主，其所崇奉之意理或主義，則宛如宗教之教義，故其排斥其他宗教，乃勢所必然。加以宗教自由必伴隨政治自由，而在極權制度之下，人民之忍受殘暴乃是一項無可避免的義務，何「自由」之有哉！所以，宗教極權主義和政治極權主義，在蘇俄共產統治之下，本如同一塊硬幣的兩面，缺乏其一，他一即不能完成。我們至少可以舉出下列兩點制度上和功能上的理由：

（一）極權政治是整個沉浸在權威主義的空氣之中的政治，所以，意理的思想上的權威，在共產政治之下，一定與政治權威互相表裏。思想權威化之具體建構，便是思想國營國有。這種思想國營國有，與產業國營國有，正好一裏一表，一心一物，控制治下人民。

（二）一個邦國如果有一個超乎一切的共同政治目標時，任何普遍的道德便無容身之地。在蘇俄，所謂「實行共產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祖國」高於一切，於是所有道德、宗教、倫理、藝術都得退避三舍，最低限度，也得編入這一政治目標之下。

俄羅斯是一個落後而充滿神祕的民族，先天上是宗教培育的溫床，而在俄共極權統治之下，民生極度的窮困，宗教又是唯一的精神慰藉。俄共既無法消除國民中留存的宗教色彩，又無法以唯物論取代宗教的地位，則在人民爭取思想與靈性的長期鬥爭中，宗教與共產主義自然站在水火不相容的相對地位了。

自一九一八年或者更早，經卅年代的極度迫害，到戰後反宗教宣傳的復蘇，五十年來，在蘇維埃政權之下，蘇俄宗教的發展雖與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衰作幾近於同一曲線的起伏，但就大體言之，宗教在冷內戰中實有着更為艱苦的遭遇。因為宗教不像民族主義，它不能受曲解，除了可供有限的政治利用之暫時機會外，共產主義是無法與之和平共存的。換句話說，宗教在共產

國家沒有「存在」的權力，頂多只能被寬容在一個隨時可變的政策之下（註八）。除了二次大戰期間外，數十年來，俄共對宗教的公開迫害，可謂無時或止，層出不窮，其中包括屠殺與禁錮傳教士（註九），毀壞與關閉數千教堂、寺廟或神社（註十）。本文雖不以俄共對宗教具體的直接迫害行為為敘述重點，但須指出的是：宗教迫害在心理根源上是出於一種「排他性」，其能否成為事實，則在於政治強力之是否干預，倘無政治因素干預宗教，迫害的事實，尤其是大規模而且長久的迫害，必無法實現。自十六世紀以還，理性主義興起，宗教自由原則確立之後，大概只能從蘇俄近代史中找到最新的樣本（註十一）。

當然，在另一方面，我們並不需要誇張蘇俄人民的宗教要求。宗教制度雖然是人類制度中非常古老的一種，宗教生活雖然是人類最早期生活的一面，但嚴格說來，並非所有的人都是「宗教人」，都非有宗教生活不可。而且，自工業革命之後，信教人數遞減乃是一個普遍現象，且成為許多學者的研究課題。此刻所要討論的，乃是宗教何以仍然繼存於蘇俄這樣極端無神主義的共黨政權之下，這個問題的解答，不但頗耐尋味，恐怕對俄共本身更有高度的實用意義。綜括言之，不外兩點原因：

- (一) 反宗教宣傳及無神主義運動之失敗；
- (二) 共產主義無法創造新的文明與道德以取代宗教之功能。

## 貳 蘇俄的反宗教宣傳

一個極權政府要使極權制度發生有效的作用，如果只訴諸壓制手段，強迫每個人為此一目標工作，還是不夠的。依現代的實例觀察，極權政府要使每個人為它的極權制度努力，重要的辦法，就是使得一般人把政府所要達到的目標看作是自己的目標。政府為人民規定信仰，同時還得想出辦法使一般人以為這種信仰正是自己的信仰，這是極權政府統制方式之一，其演變所及，必至於統治思想、教育，以至於生活之全面。

自然，極權政府要統制思想，心須藉着形形色色的宣傳，把一切消息來源皆置於一個單一機構的有效管理之下，以圖塑造一般人的思想。極權政府所作的宣傳皆趨向於一個相同的目標，一切宣傳工具都被用來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使之在心性方面產生一模一樣的品質，使一般人民所發生的心

理反應，主要地為宣傳的內容和範圍所限制。許多人以為在鐵幕內的人民之思想不能被控制，但依事實觀察，絕大多數人的思想都是依賴傳統、權威、風俗、習慣、趨勢或他人的，所以，一旦極權的思想之天羅地網佈成，則除極少數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之外，一般人因思想之資料來源悉遭管制，他們的思想內容和方向主要地不能受到極權政府的擺佈。在極權國家，如果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壓迫的感覺，並不若自由國家最大多數人所想像之尖銳，那末，這便是由於極權政府在控制人民的思想上得到高度的成功。故在與宗教的長期鬥爭中，俄共亦不得不乞靈於「宣傳」的神符——無神主義運動與反宗教宣傳。這兩者在實際運作上是相互配合的，但為敘述之便利，本文將在下一節中討論無神主義運動之部分。

如果從表面看來，蘇俄的反宗教宣傳似極注重理論，然而，一究其實，其所謂「理論」只是飾以唯物主義的玄學詞章所改裝成的神話，只是俄共官方欽賜的頒製品而已。學校、報紙、廣播、電影、一切傳播工具無一不用來支持和宣揚這種理論。此不僅應用到與宗教直接有關的範圍內，而且應用到與宗教無直接關係的範圍裏——如科學。

在反宗教宣傳中，俄共之意圖以新式機械與科學技術之炫耀蠱惑人民的宗教信念，顯然犯了誤估人性的謬誤。在其他國家，現代科技早已溶為日常生活之一體，但在蘇俄却成了蘇維埃政權超越一切及蘇俄人民優秀性的表徵，同時被應用為反宗教宣傳的工具，這實在不足以長久隱蔽任何明智的心靈（註十二）。

青年——第二代之蘇俄人民，是俄共反宗教宣傳最主要的爭取目標之一。俄國無時間斷地以誘導、強迫、恐嚇三部曲對工作中、學校中、生活中的青年作無盡止的繁冗宣傳，硬性灌輸共產主義的理念教條，「以無神論為共黨教育之主要內涵」（註十三），以大量的反宗教文學作品要「特別是青年人閱讀」（註十四），以隔絕詭戾阻止青年接近宗教。如列寧所詆毀的，宗教是「一種無效制度下的無用產物」(A useless product of a useless system)，俄共則認為：「基本上，社會主義制度可以避免成為一個『無效的』制度，在那種無效的制度之下，宗教與理想主義才得到繁延……」（註十五）。可是，在積極宣傳之同時，俄共已飽嘗失敗的滋味，一九五八年四月，第十三屆共青團大會中，第一書記謝列平 Sholepin 即慨乎其言：「如衆週

知，宗教已經破壞了共產主義的青年教育」，見該月十八日共青團真理報（*Komsomolskaya Pravda*）所載，其後，該報又於七月二日著文評論稱：「教會工作者竟未受到懲罰，他們正以最污濁的手法蠱惑青年投入宗教的網羅」。誠然，一方面由於教會本身的努力，使蘇俄青年滿足了他們在共黨教條下絕對無法獲得的靈智要求。時至今日，不僅在一般青年羣中，即在共黨青年中之宗教仍擁有莫大的潛力，直接影響下一代的蘇俄公民（註十六）。

事實上，任何形態的反宗教宣傳，應當都是俄共基本要務之一。綜觀俄共用於反宗教宣傳的武器，主要為：

（一）科學技術的成就，推翻了聖經上若干記載（這一點用來破除「迷信」或可，但迷信與宗教信仰應有區別，只要宗教能順應現代趨勢發展——此早為俄共所承認，與科學似不必相排斥）；

（二）共產主義新社會的建立，宗教將失却存在之依據（關於此詳見第四、五節所述）。

一般說來，俄共所從事的各種反宗教宣傳，在功效上較諸置壁塵上虛有其表的無神主義運動為著。但俄共絕不能憑上述二種武器，而實現其以唯物哲學及對集體主義之效忠取代宗教功能之意圖。而且，一如資本主義國家，蘇俄人民之有背棄宗教信仰者，常非由於接受「非宗教」的哲學觀，毋寧仍出於利己的自我主義者為其大宗。這不是俄共所能掠美的。

## 叁 無神主義運動

無神主義運動的溯源，大概可以追及俄共政權成立之初。蘇俄大部分有關反宗教之法令規章，在一九一八年即燦然大備。儘管二次大戰時，史達林為了迎合舉國人民的宗教感情，被迫允許某種程度的宗教自由，但戰爭一結束，立刻又密鑼緊鼓展開了如火如荼的無神主義運動，較之戰前尤有過而無不及。

在蘇俄，報紙上多的是反宗教的文章，報攤上，到處積滿通俗的無神論文學作品，如「可笑的福音書」、「有趣的聖經」等等，「科學與宗教」雜誌在題為「確實有神嗎？」、「說謊者耶穌基督」之類的文章中則愚蠢地嘲

蘇俄的反宗教鬥爭

笑人們宗教意識自由的可能性。俄共並對信教者進行所謂「個別啓發」（由一或二名指導者，經常在工作中甚至家庭中加以「啓發」，這對信教者而言，實在是最緊張的精神虐待）。一九六四年春，俄共中央全會接受黨理論家伊里奇耶夫的建議，在所有高等學校和大學，增設無神論一科，列為必修課程（註十七）。蘇俄甚至在宗教勝地柴哥斯克教堂環峙的中間建立一所國立無神論博物館（註十八）。一九六六年九月，最高蘇維埃更頒發一項新法令，禁止分發任何文件或發表談話，批評蘇俄對宗教的立場。「無神」思想交織成的羅網不可謂不密，俄共處心積慮的籌謀不可謂不深，但貝德也夫說得好：「真理給人以自由，但人也只能自由地接受真理。強迫做好事，決不會做好事，反會變成壞事」。對人民運用任何強迫手段是永遠行不通的。

在一九三七年時，蘇俄政府對提倡無神論的進展，非常自信。在蘇俄中央統計局主辦的一項全國性調查中，有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否信仰宗教？」（此一問題本身即違反蘇俄一九一八年的一道命令，該命令規定「所有官方行動中，若詢問公民是否信仰宗教，即為非法行為」。）其結果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公開宣稱信仰宗教，其餘百分之三十大部分因畏懼報復拒絕作答。事後，蘇俄當局把這些資料束諸高閣不敢公開，僅在「消息報」透露：「為簡化民意調查工作，有關宗教事項特予刪除。」其後一九三九、一九五九年之民意調查，宗教信仰問題均未列入，宣傳無神論之活動則逐漸加強。

蘇俄無神主義運動可分二個不同層面進行，一面由共黨及其衛星組織（如共青團）所推動，一面則由專設之無神組織掌理（最早有「無神聯盟 League of Godness」，「Bezbozhnik之友會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Newspaper Bezbozhnik」，一九二五年之後有「尙武無神聯盟 League of Militant Godness」，二次戰後則為「全國科學及政治知識傳播協會 Society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由於意理的思想上不相容，共產主義實先天具有無神的特性。在無神主義運動之中，除以工、農、青年為對象外，共黨猶須進行黨內的無神鬥爭，蓋人民之加入共黨，絕少因共產主義之必然反對宗教為唯一原因，故自列寧以下，俄共均只能採取彈性的機會主義的態度面對黨內宗教信仰者。在此應予指出者，即就個人心理作用而言，在俄羅斯歷史傳統神秘色彩籠罩下，共黨飢餓統治的殘酷事實下，「宗教」毋寧是人民尋求慰藉和安全的唯一

方式，心靈和精神困苦之避難所。神則是人憑其想像所創造的一種存在，此種存在不必為真實；換句話說，宗教所相信的神與永生，只是訴諸情緒和主觀的體認，不是訴諸理性和客觀的實證，俄共想用科學或其他任何方法去否定神的存在性和永生的可能性，在根本上是文不對題。同時信仰是一種真實的心理狀態，可藉以在共黨治下獲得主觀的慰藉，這是宗教不容抹殺的功能，唯物教條所無法滿足的（註十九）。

其次，願就蘇俄主要的無神組織及其工作略加敘述。

### （一）尙武無神聯盟：

成立於一九二五年復活節，主要份子多為對無神論狂熱的共黨知識份子（註廿），既與工農階級無密切聯繫，又與炫赫政治權位了無因緣，故其成立之初，蘇俄主要報紙之反應均甚冷淡，俄共及官方亦表示與之無何關聯。及至一九二九年舉行第二次大會時，始漸受重視。

尙武無神聯盟會員，主要分佈於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都市，烏克蘭等重工業區。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反宗教五年計劃開始，據稱有會員五百七十萬人，以後逐年遞減，一九三七年，據統計僅餘二百萬左右，至一九三八年舉行會員調查，竟有十五個地方分部未作任何調查結果呈報。迨一九四一年六月廿四日，德軍揮兵入境，俄共亟需教徒支持，加以對聯盟之成效久著大感失望，遂藉口「大多數人已加盟無神陣營，聯盟已無存在需要」（註廿一），使之宣告壽終正寢。追究其十七年之功過，可以說：雖然發佈了無數宣傳品，雖然關閉了不少教堂，雖然也有過許多會員，但這不等於無神論的勝利，對宗教作戰的主要目的也沒有達到。

嚴格說來，尙武無神聯盟只是俄共極權政治下的一個尾巴機構，一切活動必須配合所謂「階級鬥爭」的利益，及共黨政治經濟計劃的推行，它的主要口號之一是「為無神主義而戰即是為社會主義而戰」，它必須仰體俄共鼻息，努力證明其存在價值，最後仍難得善終（註廿二）。

### （二）全國科學及政治知識傳播協會：

戰後之二年間，無神運動陷入最低潮。俄共既痛於尙武無神聯盟之失敗，又深感於無神組織之不可一日或缺，遂於一九四七年六月，成立一個由嚴格選擇包括政治、經濟、文學、歷史、物理、化學、生物、農學、天文等各方面專家學者組成之「全國科學及政治知識傳播協會」。以向人民介紹共黨

長期計劃要旨及其理念基礎為主要使命，並在該協會之下設立「科學無神論宣傳小組」繼承尙武無神聯盟，掌理一切反宗教事項。

該小組在全國各聯邦及省普設分支部，其主要之宣傳方式有兩種：①訓練專人作長期有系統之無神演說，並成立永久性無神論夜間學校（註廿三）；②發行無神論宣傳品（註廿四）。但這些努力同屬徒勞，據俄共之自我檢討所指出：無神論演說量雖可觀，實有不足：第一、內容每多敵對性及侵略性，易引起反感；第二、常有事實之錯誤，每為聽眾糾舉；第三、命題欠妥，聽眾中信徒之比例極微。甚至黑魯曉夫亦不得不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命令提高宣傳的「理論水平」。至於印刷宣傳品，則更有一根本之致命傷，一本發行十一萬冊之反基督教作品之作者即坦承此為浪費筆墨，因為「信教的人不看，對不信教的人又多此一舉」（註廿五）。

依俄共的看法，「小組」無異已重蹈戰前「聯盟」失敗之覆轍，而正考慮增設一個以上之無神組織，以求宣傳技巧的更新及宣傳效果的加大。另外，如蘇俄大文學家梁斯妥耶夫斯基所說的，有些俄國人「比任何世界的人更容易變成一個無神論者」，而且「他們不僅只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們甚至篤信無神主義，把它當作一個新的宗教」，這種極端無神論者與共黨極權者之奉共產主義為「宗教」，實如出一轍同等荒謬。

紀德Andre Gide的話很可作為本節的結語，這位法國文學家、「從蘇俄歸來」的作者一針見血地否定了俄共的努力，他說：「在蘇俄從來未有過無神論，無神論與宗教現象完全沒有區別；對神的懷疑從來沒有進入無神論者的精神領域。在蘇俄，之所以不停而狂熱地反對宗教，完全與無神論無關，它只是反對信神而已」（註廿六）。

## 肆 共產主義「新社會」與反宗教

### ——（一）

共黨所謂「新社會」猶同於懸在人民前頭的紅蘿蔔，雖然「在新社會，什麼問題都不存在」（註廿七），但是畫餅充飢望梅止渴終屬於事無濟，爲了遏止，而不是滿足人民這種飢渴，蘇俄共黨乃必須完成以下三項工作：

（一）要求一般人同意官方所訂的最後目標，容忍並接受官方所持某些特



殊手段及對於事實的看法；

(二)強調目的與手段不同，證明凡未實現的都是好的，凡已實現的都是不好的。所以，爲了未來的好，必須忍受現在的不好；

(三)誘導一般人接受官方所規定之價值判斷。

此爲俄共一貫作法，亦可由其有關宗教之措施得到驗證。但如以上所指出，俄共倘無法建立新的文化和道德，則不僅「新社會」無法實現，即宗教亦無撲滅可能。故「道德重建」與進行「文化革命」乃成爲俄共重要課題。

### (一)道德重建：

幾乎任何道德問題，都無法擺脫宗教之影響。即使在蘇俄，宗教亦有其源遠悠久的根基、堅韌的生命力、與強烈的潛默的感染性，不獨教徒謹慎地將宗教倫道奉爲生活準則，即非教徒亦多在意識的行爲與非意識的習慣中自然接受宗教的規範，宗教並且超越神論的藩籬，影響及於共黨統治下的第二代蘇俄青年，從而成爲共黨「新道德」的最大障礙，即俄共本身亦承認「如果不能戰勝宗教思想，共產主義道德與科學世界觀的實現根本不能想像」(註廿八)，並且處心積慮力謀贏得這一場宗教與共產主義的「艱苦而絕不容許讓步的鬥爭」(註廿九)。

蘇俄官方會釐定頒佈一項所謂「客觀」而「普遍」的「共產主義創造者道德法典」，「要求全國人民在日常生活及行動中付諸實現」(註卅)。但如所週知的，極權社會中所謂道德法典，並非告訴我們道德中人道主義的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同情弱者、尊重個人等等，而只是把一整套「價值觀念」灌輸給人民，從而利用宣傳手段，製造所謂「集體主義的道德」。極權主義者所謂的道德，實際上是破壞一切道德。人的真實感和尊重真理，乃一切道德的基礎，極權主義者則盡力顛覆、揉碎這種基礎。我們可以從俄共「道德法典」所揭櫫和依據的三項基本原則得到印證：

◎恪守共產主義最高倫理原則，效忠共產主義，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爲贏得共產主義而戰——是蘇俄人民的終極目標，最高的至善亦在於此；

◎「道德法典」建築在列寧所訂共產主義者的教條——爲共產主義之壯

蘇俄的反宗教鬥爭

大與實現奮鬥——所構成的基礎上，蘇俄人民一切行爲均以此爲評價標準，「道德法典」一切要求皆附屬此神聖目標之下(註卅一)。

以上三原則實可歸結爲一，即對共產主義的盲忠與盲信。由此推論，則凡奉行共黨條教，傾力服膺共產主義即「道德的」，否則，即「不道德的」。「道德法典」即準此基線作如下之規定：

◎個人與社會之關係：

①效忠共產主義，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②爲社會利益忠誠工作：不工作者不得食；

③關心社會財富之增加及保存；

◎個人與個人之關係：

①注重集體主義及友好互助，我爲人人，人人爲我；

②人性對待相互尊重，彼此是朋友、同志、兄弟。

◎個人應具備之德性：

①在社會及私生活中忠誠、信實、純潔、單純、謙和；

②在家庭中互敬互重，關心子女教育；

③在互敬互重，愛心及靈性交流之上建立永固的婚姻關係；

④對不義的、依賴的、不忠實的、自私自利的、貪婪的，絕不妥協(註卅三)。

◎國家與國家之關係(下略)(註卅四)。

這項「道德法典」，俄共雖然要求「應不止於熟讀熟背，更要加以消化吸收，經由意識地接受，使成爲個人的道德信念，具體實現於億萬人民日常生活及行動之中」(註卅五)。但實際上，它除了自行暴露了蘇俄社會的弱點(它所標榜的適爲蘇俄社會所鮮有，所詆毀的則隨處可見)，造成蘇俄人民——包括許多共黨黨員——道德的「雙重人格」(使言行不一)，更主要地在宗教的阻力下觸礁(佔全俄人口百分之三十的教徒無疑不能接受，而其他爲數衆多的非教徒，亦仍習於自宗教和哲學的領域內尋求道德的庇蔭)。俄共期盼經由道德架構的重建，以唯物主義代替宗教思想，以共產制度代替宗教規範，却無法改變人民通過實踐標準所作的選擇。